

□国际关系研究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 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外交

门 洪 华

【摘 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具有深刻哲学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意在保存自己、不露锋芒、抓住机遇、徐图发展。以此战略方针为指导，中国决策者提出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在国际上冷静判断形势发展和利用机遇，强调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有所作为。由此，中国外交战略由内向性转为外向性，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全面参与者。秉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中国度过了冷战结束前后的艰难岁月。中国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强大冲击波，稳住了阵脚，顶住了挑战，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和施压，同时避免了意识形态争论以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抗，使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与此同时，中国把握了机遇，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实现突破性发展，同东欧国家和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建立新型友好合作关系，大力加强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与合作，积极推动多边合作，中国外交迅速重新打开了局面。

【关键词】中国外交；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邓小平外交思想；战略研究

【收稿日期】2016-01-22

【DOI】10.15939/j.jujss.2016.04.009

【作者简介】门洪华，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法学博士。（上海 200092）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风云激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而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1989 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制裁，借机施加巨大压力，西方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动新的“冷战”，要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出现第二个高潮，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1]世界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动对中国外交形成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

在重大的历史关头，邓小平高瞻远瞩，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方向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使中国外交政策在国内外局势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下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国外交平稳过渡到后冷战时期。^[2]³⁰³ 以此战略方针为指导，中国决策者提出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在国际上冷静判断形势发展和利用机遇，强调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有所作为。在此基础上，中国外交战略由内向性转为外向性，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全面参与者。^[3]在具体举措上，中国利用矛盾，很快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大力开展睦邻外交，实现了同东亚国家的全面建交；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有针对性地同有损中国主权的行为进行斗争；强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根据国情决定改革开放的步骤、领域和速度。^[4]

面对波诡云谲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决策者目标宏远，坚定从容。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指出，“纵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这十年时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胜利”^{[5]354}。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战略目标提前实现，为中国在21世纪的更大作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溯20世纪90年代，这是全球范围的适应和调整期，也是中国走出政治风波后西方“制裁”和压力的阴影、恢复改革开放之初的强劲发展势头、迅速进入经济全球化前列的时期。中国经历了大风大雨和各种艰难考验，总体上实现了安定和谐、平顺向上。^{[6]16}中国坚守着社会主义阵地，打破了西方的制裁和施压，稳健而全面地融入了国际社会，确保了国家持续而快速的发展，树立了和平发展、开放繁荣的国际形象。

一、冷战后中国外交面临的国际形势

（一）两极格局解体对国际局势的影响

1989年是战后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一年。苏联社会内部的全面危机、东欧各国内部的政治危机以及由此加剧的苏维埃联盟国家和华约集团内部关系的危机，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作用下爆发，酿成了空前的动荡局面。美国趁机提出并加紧推行所谓“超越遏制”战略，对苏联、东欧国家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和平演变”攻势。在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夹击之下，1989年和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共产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苏联政局发生新的动荡。1991年，苏联“8·19事件”之后，国内政局急转直下，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苏联解体。原苏联和东欧9个国家分裂为20多个国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舞台发生的最重大历史事件，近半个世纪苏美对抗的两极格局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严重挫折。

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分界线，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意识形态斗争的重心转向中国。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种种公开或秘密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政治渗透，妄图把苏东国家甚嚣尘上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浪潮移植到中国来，对中国以压促变。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5]344}。在国际关系进入新一轮大动荡、各种矛盾分外复杂的情势下，国际上出现了一些舆论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出面扛旗当头、带头与西方霸权压力抗衡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临着历史性的严峻考验。

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在世界政治中一超独大的局面凸显，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霸权主义明显上升。1989年12月，美国军事入侵巴拿马，拘捕其在任总统诺列加。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以解放科威特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1991年1月17日至2月28日，美国发动进攻并彻底摧毁了伊拉克军队。伊拉克战争标志着两极格局已经不起作用，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俨然形成。有人开始鼓吹“历史终结论”。^[7-8]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向世界推销其价值观和发展道路，南北矛盾进一步突出。南北矛盾的实质是经济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相互依赖、共存共荣的一面，也有剥削和被剥削的一面，前者对后者的剥削是关系的实质。无论这种剥削是采取经济、技术援助的方式，还是采取更为赤裸裸的军事干涉、政治控制的方式，它都是实际存在的，并由此造成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有所突出。美欧日之间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它们之间的经济矛盾上升，呈现三强争雄之势。苏联威胁的消失使西方内部凝聚力

降低,主要体现在:日本致力于走向政治大国,在世界秩序、东亚事务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颇显进取态势;随着欧洲联合的进一步深入,欧盟的建立使得欧洲有了恢复世界权力中心的期望。这些变化与致力于建立单极体系的美国存在着深刻的战略矛盾。

此外,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之间被冷战掩盖的领土纠纷、种族迁移等历史遗留问题,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干预和影响愈发突显出来,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了更多因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条件不同而产生的现实经济利益冲突。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导致各种力量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各种矛盾此消彼长,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各主要国家着眼于跨世纪的综合国力竞争,在高科技、贸易、战略资源、汇率、人才等领域展开争夺,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成为各大力量论争的焦点。

(二) 1989 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与西方对华制裁

在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1989 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风波,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推到紧要关口。在中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同时,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二战结束以来的空前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来自国际共运内部的空前冲击,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倾斜。西方政治势力利用这一时机,加大和平演变的力度,如何顶住西方实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压力,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平息这场风波本属中国内政,但却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攻击和制裁。实际上,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美国政界和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大量的报道,其希望并推动中国向美国式民主转化的倾向显而易见。当其企图遭到挫败后,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媒体诋毁中国的反应极为强烈。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裁中国,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也分别通过了制裁中国的议案。一时间,中美关系阴云密布,降到了 1979 年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在美国的带动下,西欧一些国家和日本紧随其后,共有 20 多个国家参与了对中国的制裁,一些受美国影响的国际组织也采取了相应行动。澳大利亚政府于 6 月 4 日,丹麦、瑞典政府等于 6 月 5 日,法国、英国、西班牙、新西兰、日本政府于 6 月 6 日,加拿大政府于 6 月 12 日,联邦德国政府于 6 月 14 日宣布对中国实行各种形式的“制裁”。6 月 26 日,世界银行发表声明,宣布推迟考虑对中国的几项贷款。6 月 27 日,欧洲经济共同体 12 国政府领导人在欧共体第 41 届首脑会议上宣布对中国实行系列制裁措施。7 月 6 日,关贸总协定发言人称该组织无限期推迟有关中国申请复关的讨论。7 月 14—16 日,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七国首脑与欧共体主席在巴黎召开会议,宣称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接触、延缓世界银行贷款等制裁措施,是为西方制裁中国的“高潮”。参与制裁中国的有美国、欧共体 12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它们企图中止高层接触在政治和外交上孤立中国,延缓贷款、撤走技术人员等在经济上加重中国困难,以中止高技术和军事合作威胁中国,以达到以压促变的目的。

(三) 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认识

两极格局解体使得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但是原有的国际大趋势并未完全消失,而是更加突出,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多极化是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就初现端倪。当时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竞争激烈,出现苏攻美守之势,西欧、日本经济实力趋强,经济上渐成美日欧三足鼎立局面,而日益壮大的中国受到各大国的重视,国际力量出现大分化、大组合。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1 年 7 月 6 日在堪萨斯城提出了“美、苏、中、西欧、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的观点;毛泽东则于 1974 年 2

月22日首次阐明了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这些观点都代表着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战略判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加速,超级大国左右国际局势的能力下降。邓小平深入考察国际形势变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5]105}。以此判断为基础,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现在我们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5]94}。与此同时,邓小平密切关注世界形势变化,非常重视做欧洲和日本的工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时代宣告结束。当时,国际上和国内出现了对世界“新格局”的种种议论和看法。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指出,“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5]329}。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一去不返,新的世界格局虽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却尚未完全形成。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纵览全局后明确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两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5]353-354}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5]363}。

邓小平关于多极化趋势的判断,为中国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世界格局由两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是由世界各大战略力量的对比消长与分化所决定的,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二战结束至80年代末,以美苏对抗为主要内容的两极格局始终影响甚至左右着国际形势,冷战和对抗的局面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和。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分量越来越重。特别是不结盟运动的出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选择了不与超级大国结盟的中立道路,这本身就是对两极格局的突破,也成为促进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根本上削弱了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的能力。与此同时,各国争取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反对超级大国控制与干涉的斗争成为多极化发展趋势的重要政治因素。其间,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为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推动多极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冷战结束标志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不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终结。在原有国际平衡被打破的情势下,美国力图利用这一时机建立所谓的单极体系,其所作为引致了单极化和多极化的论争。美国是影响世界多极化格局形成的一个长期起作用的因素,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将维持较长时间,故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是长期的。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条件下提出继续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并倡议国际政治秩序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结合,完整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9]141}可以说,多极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进程,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当然,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是在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时代的进步。多极化趋势在各层次、各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削弱和抑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有利于争取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新的世纪。它为中国外交工作的全面展开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

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战略方针的确立

(一)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战略方针的提出

面对冷战结束前后的风云激荡，邓小平用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语言，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邓小平提出这一战略方针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情势下，在中国因政治风波而遭到西方制裁的不利国际环境下，党内一些同志做出错误的战略判断，担心美国将“挥师东向”，集中力量遏制中国。当时党内出现某种悲观情绪，认为世界格局已成为“美国独霸”，中国在国际上无足轻重。一些同志不够沉着冷静，在国内工作中要求以“反和平演变”为纲，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对外工作中提出同美国和西方对抗的激进主张。此外，某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要求中国“扛旗当头”，结成抗衡西方的联合阵线。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由邓小平同志逐步提出的。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提出“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他告诫中央负责同志估计世界形势要清醒，控制中国局势要注意方法；他特别请中央负责同志向全党各级领导转达他这样一句话“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不要惊慌失措。^{[5]286}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对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5]321}。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提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5]311-312}。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指出，“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我特别推荐五十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5]328}。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提出了如何看待国际形势变化的问题，他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5]354}。他进而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具体的做法，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往来。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往来。”^{[5]353}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5]360}。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5]363}。1992年4月28日，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10]1346}。邓小平的上述一系列讲话确立了冷战后中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和目标，被总结概括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

战略方针。

1995年,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对这一战略思想提出的背景和内涵做出了一个完整而准确的论述:“进入90年代前后,国际风云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两极格局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中国面临西方国家联合施加压力和制裁的威胁。邓小平同志综观全局,对形势突变及时做出了精辟的论断,谆谆教导我们,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他指出,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有数;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而且应该有所作为”^{[11]6-7}。

(二)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的含义

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具有深刻哲学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意在保存自己、不露锋芒、抓住机遇、徐图发展。其深刻含义包含如下主要内容:

第一,稳住阵脚、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所谓稳住阵脚,就是在国际形势发生动荡、出现于我不利的国际环境时不自乱阵脚,而是泰然处之,努力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毫不动摇地沿着既定的正确路线和方向前进。其根本立足点在于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所谓冷静观察,就是要用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为一时一事所左右,在国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动之际,不急不躁,冷静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抓住国际形势变化背后的本质,作出准确而科学的判断,为制定正确的应对策略提供基础。冷静观察要点在于冷静观察社会主义国家的动乱,深刻认识国际形势的变化。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5]320}。在社会主义国家处在重大演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不仅密切观察苏东形势,而且对中国的战略方向作出部署。针对国际形势变化,邓小平反复告诫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要冷静,“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5]54}。所谓沉着应付,就是面对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处变不惊,镇定从容,善谋对策,从容应对,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概言之,冷静观察是正确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的起点和前提,稳住阵脚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基点和保障,沉着应付则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的落脚点,也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有效途径。

第二,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其基本含义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出发,既有雄心大志,又善于守拙,避免张扬自己,避免引火烧身。“韬光养晦”的基本战略含义是,珍惜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把意识形态斗争和国家关系分开处理,尽量避免卷入不必要的国际纠纷之中,抓紧时间发展自己,中国强大起来永远不称霸;与此同时,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但不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不当第三世界的头,避免将矛盾的焦点集中到自己身上,避免不必要的纠缠和束缚。不称霸并不是说不谋求发展壮大,中国需要发展壮大,也只有强大起来,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才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不当头并不是说要疏远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而是要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不扛旗并不是说中国不公开声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主要是指不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自居,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发号施令,不一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针锋相对。

要韬光养晦，就必须决不当头。实际上，邓小平早在 80 年代初就提出了“决不当头”的思想。1982 年 8 月 21 日，他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明确提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12]416}。邓小平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把不扛旗、不当头提到根本国策的位置上来，使我们避免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左倾”激进主义，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主动。

第三，埋头苦干，做好自己的事情。韬光养晦的战略目标指向是，不要张扬，多做实事，“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5]32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面对冷战后的国际形势，中国应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经济建设上，“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5]354}。加速中国经济发展，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好就是对人类进步的最大贡献。邓小平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5]356}

第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应该而且能够有所作为。韬光养晦绝不等同于单纯的防守退却或被动应付，也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作为。邓小平指出“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5]350}只有有所作为，才能体现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分量；只有有所作为，才能打破西方强国对中国的歧视，争得同它们平等互利的国际权利；只有有所作为，才能增强中国的国际信誉，从而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历史时期，中国作为多极格局中的一极自然应该为世界的进步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5]350}有所作为体现在，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根本利益及民族尊严等问题上，在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在涉及周边地区和平的问题上，中国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可以说，利用矛盾，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在国际上有所作为的重点。

（三）“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精神实质

20 世纪 90 年代，“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成为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主导性原则。在对参与国际事务的理论总结过程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韬光养晦是一种哲学原则，体现的是思想高度，而有所作为是一种实践原则，体现的是进取精神。当然，有所作为，也有其哲学含义，即根据自己的战略判断，有所为有所不为。^{[13]192}

韬光养晦，是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智慧的经典表述，蕴藉着丰富的内涵。“韬”是指掩藏，“韬光”是指收敛锋芒“晦”是晦迹，即隐居，不让人知道自己的踪迹，“养晦”为隐居待时。中国古人常常将韬光养晦与善于藏拙并用。传统上的“韬光养晦”强调退守自保，戒禁争强好胜，是中国人辩证哲学思想的体现，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20 世纪 90 年代初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其含义是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的，即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中国只要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就能够稳定发展，能够实现现代化，进而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中国不要在国际上去论证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如何优越，不要去进行意识形态的论战，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邓小平当时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韬光养晦”韬的是意识形态的“光”，即中国不从意识形态上去论证社会主义的前途、希望和优越性，而是用 1/5 世界人口的

实践来说话 “韬光养晦”养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崛起与发展的“晦”，即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14]因此，“韬光养晦”的主要内涵是：中国不示弱，不做附庸，但也不逞强，不搞霸权；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利用别国，但也不怕制裁，不接受别国干涉我国内政；中国不贬低自己，但也不高估自己，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中国同谁都可以交朋友、打交道，但又坚持原则，不失尊严，趋利避害；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又不以社会制度为标准来处理国家关系；中国关注国际局势和国际事务，但又集中主要精力加快发展和壮大自己，并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的共同繁荣发展。这里的“韬光养晦”不是中国古代成语常有的养精蓄锐以备将来一击的含义，而是同有所作为联系起来，“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并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5][16]367}

“韬光养晦”的精神实质是稳住阵脚，冷静观察，善于应付，长期埋头苦干，集中精力干中国自己的事，在国际上当头、不扛旗；有所作为的精神实质是不妄自菲薄，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可以说，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辩证的统一，二者不可偏废。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消极退缩，有所作为也不意味着无所不为。在国际问题上，中国既有雄心壮志，又善于藏拙，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避免引火烧身。在中国力量有所发展时，尤其要注意避免不切实际的头脑发热。^[17]这种辩证思维既有助于我们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又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国际影响，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韬光养晦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为国内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有所作为是要促进韬光养晦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必须有所作为，但要讲究策略，把握时机，拿捏分寸。有所作为不是当头、扛旗，而是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有所作为中注意韬光养晦，是邓小平思想的战略创新。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的核心思想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建设和发展上，密切结合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恰当处理好国家实力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其核心主旨在于，一个国家的崛起和国际地位，是其综合力量长期积累的结果，也得益于谨慎巧妙地处理对外关系，善加利用各种有利条件而避开风险，尽量避免或较少地过早卷入国际纠纷，或承担不适当的义务而消耗力量，有所为有所不为。^{[18]124-125}“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本质就是通过“和平发展”，以自身的责任感发挥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即“发展自己、影响世界”。2010年12月6日，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撰文指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句话是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讲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19]。

三、“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的实施与成效

（一）顶住西方制裁的压力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与施压，邓小平对内要求“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5]311}，“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示弱”^{[5]320}，另一方面仍然要“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5]359}。邓小平对外严厉批驳西方对我国内政的干涉，严正表示中国吓不倒，“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5]329}，“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5]359}；另一方面又告诉西方国家“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5]361}。上述认识

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在应对和顶住西方制裁压力上的具体运用。

中国在采取果断措施稳定国内秩序的同时，在外交上采取坚持原则、利用矛盾、广交朋友、多做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的方针，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坚持对话而不搞对抗，继续与美国、西欧和日本打交道，积极寻求改善关系，通过对话和沟通来寻求解决；中国利用西欧、日本等国家对中国市场需求的经济利益杠杆，同他们继续发展经贸关系，以推动其他领域的关系和其他国家关系，用开放市场来开拓政治对话，逐步挫败了西方国家试图孤立中国的图谋。在顶住西方制裁的压力上，首当其冲的是如何应对中美关系变局。中国针对美国的制裁行为进行严正交涉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如 1989 年 7 月提出取消 1990 年根据“富布莱特计划”（Fulbright Program）向美国派出留学生，停止接受美国派来的“和平队”（Peace Corps）计划，拒绝“美国之音”派替补记者来华。与此同时，中国主动出击，通过说理力求打破中美关系僵局。1989 年 10 月 31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另一方面，“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5]330-332}

中国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顶住了美国制裁的压力，并努力利用国际形势变化促使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美国采取的制裁措施主要包括停止高层接触、停止贷款、停止军方领导人互访、停止军售和军民两用技术转让、延长中国留学生在美逗留时间等，实际上除后两项执行得比较坚决外，前几项措施或是不攻自破或是陆续被打破。其间，美国根据其国家利益需要和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稳定发展，也不断调整和逐步弱化了制裁。首先，美国实际上并未执行停止高层接触的制裁措施。1989 年 6 月 20 日，美国宣布暂停中美两国政府高级官员接触。7 月 1—2 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就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7 月 31 日，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巴黎利用参加安理会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会议的机会会晤了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9 月 28 日，贝克利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再次与钱其琛会晤。12 月 9—10 日，斯考克罗夫特以通报美苏首脑马耳他会谈情况为由公开访华。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8 月 5 日美国助理国务卿所罗门访华，通报美国在海湾危机中的立场，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应贝克国务卿邀请，钱其琛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11 月 30 日下午，布什总统在白宫会见钱其琛，这次访问实际上打破了美国中止与中国高层互访的制裁，中美关系走向初步稳定。其次，美国等在贷款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1989 年 12 月 19 日，布什总统决定取消美国进出口银行暂停对美国方面同中国进行商业活动给予资助的禁令。1990 年 1 月 11 日，国务院宣布撤消北京部分地区的戒严令。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部分改变我们的世界银行政策，同意世界银行为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向中国提供贷款”。1990 年 2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总额为 5.9 亿美元的五笔贷款。1990 年 2 月 2 日，美国政府所属的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提供了 975 万美元贷款。其三，在军事交流、军售等问题上，通过中方努力，美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例如，1992 年 2 月 21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美国政府取消 1991 年 6 月实施的对华制裁措施；1992 年 12 月 2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布什总统决定了结因 1989 年政治风波而中止的四宗对华军售项目；1993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查尔斯·弗里曼访华，双方同意重开在军事领域的对话与交流。

尽管中国顶住了美国制裁的压力，但中美关系并没有走向全面稳定。尤其是 1993 年初克林顿上台之后，美国在台湾、西藏、南沙群岛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对中国人

权状况横加指责,并将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政治化。从1993年开始,国家主席江泽民利用各种场合阐述中国解决中美分歧和矛盾的十六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中国政府逐步确立了冷战后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方针,即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和施加压力的做法,对美斗争但不使中美关系破裂,而且还要争取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2]309}

日本追随美国参加了制裁和孤立中国的行动,如冻结对华日元贷款等。但是,日本在1989年7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就提出应该避免孤立中国的主张。当年8月,新组建的海部俊树内阁宣布采取与中国接触的政策。8月18日,日本外务省解除访华禁令,同时宣布恢复对华援助项目。12月5日,日本外务省宣布恢复对华无偿援助。1990年7月,海部俊树在当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恢复对华政府贷款。此后,日本率先恢复了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互访,1991年8月海部俊树首相访华,1992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日,当年10月日本天皇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日高层互访成为保持中日关系稳定的重要措施,两国经贸关系也得到迅速发展。中日关系发展总体上处于较好的时期,尽管钓鱼岛问题、日台关系问题、日本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暗潮涌动。

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对中欧关系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些欧洲国家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并参与美国孤立中国的行动,导致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一度迅速下滑。中国同西欧国家的矛盾主要发生在人权和涉及中国主权的西藏和台湾等问题上,当时欧共体以人权为由宣布对中国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此后一段时间,欧共体/欧盟、欧洲议会等不断在人权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一方面坚决反对西欧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同时也采取措施逐步改善中欧关系,提出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发展国与国关系的“三超越”原则,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中欧高层对话和互访逐渐恢复。加上欧洲国家内部的变化及其对华经贸合作的需求,西欧国家制裁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很快被打破。1990年10月,欧共体外交部长会议宣布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关系,取消了除首脑互访、军事合作及军品贸易以外的其他制裁措施。此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恢复对华出口信贷和政府贷款,并开始逐步执行过去承诺的援助项目。1991年7月,欧共体决定恢复中欧首脑互访,其他方面的合作趋于正常。1994年12月22日,欧盟轮值主席代表欧盟正式通知中方,取消1989年以来的几乎所有制裁措施。

综上所述,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的指引下,中国非但没有在西方的重压下垮下去,反而发展强大了。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西方国家由对中国进行集体制裁转变为竞相与中国改善关系,开展经贸合作。^{[20]290}

(二) 与新独立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苏联解体之后,中国面临的重大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东欧国家、俄罗斯及从苏联独立的新国家的关系。上台之初,这些历经剧变的东欧国家新政权出于国内外政治需要,在对华关系上不同程度地凸显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的不同。中国在苏东政权更迭之时,及时在各种场合反复向这些国家说明中国的立场原则,即绝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双边关系仍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并采取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价值观念差异的灵活政策。中国的立场受到这些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欢迎,因此在政局急剧变化的同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未受影响,或维护或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双边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得到发展。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中国政府立即宣布正式承认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中国始终对这一地区采取积极的外交姿态。这些新国家独立之初,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向他们提供政府贷款或商品贷款,并热情接待这些国家领导人来华访问,从而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9 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完全恢复正常化。中国决策者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必将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本身带来严重后果，采取了冷静观察、不论战的态度。1990 年 3 月 3 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不论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5]353}。苏联解体后，国内一些人处于义愤，提出要公开点名批评“背叛了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邓小平当即表示，不要批评、不要点名、不要伤人，这样在外交上为处于困境的中国外交提供了一个进退自由、留有余地的外交施展空间。^{[20]300}中国在苏联解体的当天就宣布承认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以后不但没有点名批评强烈反对苏共的叶利钦，反而邀请他来中国访问。1992 年，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首次访问中国，中俄双方签署了 24 个政府间协定文件，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互相是友好国家。1994 年初，叶利钦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信，提出在中俄之间“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当年 9 月，江泽民访问俄罗斯，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决心面向 21 世纪，把两国关系提高到崭新水平”。

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于苏联解体前先后宣布独立，中国虽积极做工作，但在苏联自己承认三国独立之前，中国暂时未作外交承认。1991 年 9 月 6 日，苏联国务委员会宣布正式承认三国独立。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 7 日分别致电三国外长，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其独立。中国立即派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前往三国访问，商谈建交问题，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中国与这三个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外交关系。冷战结束后，台湾当局费尽心机寻求“外交突破”，1992 年 1 月 29 日与拉脱维亚签署了“建立领事关系的联合声明”，并于 2 月底在拉脱维亚开设“总领事馆”。中国中央政府立即发表强硬声明，宣布从拉脱维亚撤馆，但并未宣布断交，从而留有工作余地。同时，中国加强对拉脱维亚周边国家的工作，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一方面遏制了拉脱维亚现象的蔓延，另一方面也促使拉脱维亚重新考虑与台湾的关系。拉脱维亚与台湾建立“领事关系”一年多，仅从台湾获得了 100 多万美元的原油，却付出了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昂贵代价。1994 年 7 月 28 日，拉脱维亚终于与中国签署联合声明，在接受中国关于台湾问题原则立场的基础上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出现了五个新独立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前三个国家直接与中国接壤，边界线长达 3 300 公里，它们成为中国新的周边国家。中国非常重视与中亚新独立国家的关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于 1992 年 1 月 28 日率团访问中亚五国，用 5 天时间完成了与这五个国家建交的全部工作，迅速稳定了苏联解体给中国西北方向造成的局势动荡。中国与各国解决或友好谈判边界领土问题，高层领导人频繁互访，签署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边界以及在边境地区撤军的条约和协定，双方都表示要建设新的丝绸之路，使“我们的联系将比我们的祖先更加宽广”，双边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1]

（三）稳定周边改善国际环境

塑造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历来是中国对外政策中影响全局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围绕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形势发生重大改变，中国把周边外交放到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政府在一般强调同各国广泛友好合作的同时，突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16]384}，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指导思想，积极慎重地处理周边形势变化引发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把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作为新形势下对外关系的一项重点工作加以推进，并致力于通过高层互访加强政治互信、慎重处理和解决边界争端、密切经贸合作等几个方面巩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不仅开始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

(ARF) 等地区多边机制的活动,还积极促成了“上海五国机制”的建立,多边外交取得新突破。概言之,冷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关系,周边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周边外交取得不菲成就。中国与少数曾经关系不好的国家发展正常关系,为周边外交的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9年10月,老挝部长会议主席凯山访问中国,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1990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老挝;1990年5月,蒙古人民大呼拉尔主席访华,中国和蒙古的关系实现正常化,1991年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对蒙古进行国事访问;1990年8月,中国和印尼正式恢复中断23年之久的外交关系,当年李鹏总理与印尼总统苏哈托实现互访;1990年9月,中国和新加坡就建交问题达成协议,10月3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总理实现互访;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从1990年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1991年11月越共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联袂访华,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1992年李鹏总理访问越南,1993年10月中越正式签署《关于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40多年相互隔绝的历史。

中国推动改革开放之初就致力于加强与东盟的交往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东盟形成了对中国的独立判断,因而能够顶住西方的巨大压力,公开表示1989年政治风波是中国内政,应该与中国继续接触,包括尚未与中国复交的印度尼西亚也在1989年中国国庆时发来贺电。中国为了打破西方的封锁,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也带动了中国与东盟关系取得积极成效,到1991年中国与东盟十国都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为此后中国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巨大的动力。^{[6]20-21}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各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开始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双边互访活动频繁,政治关系良好,经贸关系密切。1997年12月16日,中国与东盟举行历史上首次首脑会晤,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确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1]进入90年代,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高层领导人双边互访频繁。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保持了发展势头,中印领导人多次互访,促进了两国政党、议会、军队及民间组织间的友好往来,双方在科技合作、经贸合作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1996年11月28—30日,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两国领导人确立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印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先后签署《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宁的协定》(1993年)、《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1996年),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具有实质性意义。

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后,双方关系发展迅速。1992—1993年,五国领导人相继访华。1994年4月,李鹏总理回访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提出了中国发展同中亚关系的四项基本政策(即坚持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开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独立主权、促进地区稳定),声明中国不谋求政治势力范围和经济势力范围,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中亚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增加了政治信任,为双方密切经济合作关系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高层互访推动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积累,经贸关系愈加密切,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上也不断取得进展。1996年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会晤,启动上海五国机制,并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议》。1997年4月24日,五国元首在莫斯科会晤,并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上述两个协定不仅事实上结束了五国长达7000多公里共同边界冲突与对峙的历史,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也为周边邻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和有益的启示。

(四)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政府在积极开展双边外交、维护国家利益、为改革开放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的同时，还大力推动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尤其是中国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参与国际机制方面越来越体现出积极参与者的特征。^[22]

早在 1988 年，邓小平就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作为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的重要补充，强调新秩序的建设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23]1533-1534} 冷战结束后，邓小平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视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两翼，强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重要体现^{[5]353, 363}，此后中国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围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展开。提出和实施多极化战略是中国支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有力措施。中国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后，其中一个重大的具有创造性的外交政策行为就是发展邓小平关于“多极”的战略思想，在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多极化的外交主张，郑重宣布“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中国提出多极化主张，致力于联合各种和平力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的多极化主张切中了各大国尤其是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获得了俄罗斯、法国、德国等大国的认可。90 年代中后期，中俄、中法明确宣布合作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国际事务中任何进行支配的企图，以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

与此同时，中国致力于和外部世界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确立“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加快多边外交的步伐，积极而富有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全球融入和国际参与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的各项活动，是中国全面而深入融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标志。中国领导人参加了联合国主持或倡议召开的所有重大多边会议，这包括李鹏总理出席 1992 年首次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议，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李鹏出席 1994 年首次地球峰会和 1995 年关于社会发展的全球首脑会议。在影响世界政治与国际安全的重大事务中，中国坚持强调联合国安理会应承担首要责任，反对在重大事务中搞单边主义和单边行动。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扩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1990 年，中国首次向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派遣军事观察员。1992 年，中国组建第一支维和部队前往柬埔寨维和。此后中国参加了埃塞俄比亚、刚果（金）、厄立特里亚、东帝汶、海地、利比里亚等地的维和行动，并增加了联合国维和经费的摊款比例。与此同时，中国深刻认识到参加地区性和跨地区性多边活动的重要性，主动倡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的活动，为解决朝核问题主持召开了“四方会谈”和后来的“六方会谈”。中国领导人还积极参加亚太地区之外的多边机制，自 1996 年起参加亚欧首脑会议，1998 年与欧盟建立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重要责任。中国致力于维护公正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不利于世界和平的力量和主张，庄严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与此同时，中国注重申张正义，秉持公正立场，维护中小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囿于国际环境和自身实力的限制，中国遵循“韬光养晦”的原则，采取与国际环境和自身国家实力相适应的适度参与政策。

四、简单的结论

秉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中国度过了冷战结束前后的艰难岁月。中国经受

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强大冲击波，稳住了阵脚，顶住了挑战，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和施压。与此同时，中国把握了机遇，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实现突破性发展，同东欧国家和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建立新型友好合作关系，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与合作，积极推动多边合作，中国外交迅速重新打开了局面。

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化被动为主动，成功解决了面临的各种棘手的国际难题，顶住了国际形势变化和外国制裁的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同时，避开了国际斗争的风口浪尖，避免了意识形态争论以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抗，使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发展再现高潮，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仅没有像西方国家预料的那样“大失败”、“垮台”，反而日益发展壮大，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 [1] 刘华秋 《邓小平与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党的文献》，2004年5期。
- [2] 牛军编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概论（1949—200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3] 门洪华 《中国国际战略演进及其经验总结》，《教学与研究》，2009年10期。
- [4] 章百家 《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1期。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 [6] 王逸舟、谭秀英主编 《中国外交60年（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 [7] Fukuyama F.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89/1990, (16): 3-18.
- [8] Fukuyama F.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 [9] 叶自成 《新中国外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 [11] 钱其琛 《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1995年12月12日），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 [1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3] 门洪华 《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国际制度与战略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14] 曲星 《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5期。
- [15] 李宝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教学与研究》，1998年11期。
- [16] 谢益显主编 《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
- [17] 曲星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现实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11期。
- [18] 赵进军主编 《新中国外交60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19] 戴秉国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2010年12月6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t/dnzt/jianchizouhepingfazhandao/1774662.htm>，2015年11月21日。
- [20] 冯特君主编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
- [21] 石源华 《论新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5期。
- [22] 门洪华 《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2期。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责任编辑：刘文山]

**The Public Evalu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Power Exercising in District Government:
Taking Nanguan District in Changchun City as an Example**

XU Yu-zhen , XIAO Qiao (72)

Abstract: The district government is the important undertaker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grass-roots social management in our country , which often directly facing to citizen in the exercising power and directly refer to the ordinary people on the evaluation of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 power. Now it is true that some degree anomie phenomenon exist in district government power operation.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it is lack the principle of people-centered position. Nanguan district city in Changchun discusses the principle of people-centered and public evaluation mechanism which taking the community as the platform. In consequence , there are many matters such as the paradox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 , the deviation between original intention and practice need us persistently improv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Keywords: district government; exercise of power; public evaluation; Nanguan District in Changchun City

“Keeping Low Profile and Striving to Make Achievements” Strategy and China’s Diplomacy in 1990s

MEN Hong-hua (81)

Abstract: Based on profound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guiding value, “keeping low profile and striving to make achievements” literally means countries should preserve its own power by hiding its capability ,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gard this as guideline , China’s decision-makers believed that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quicken the open-up policy’s steps inside China , and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 China should judge the situation with a cool head and using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So , China’s strategic direction changed from introversion to extroversion. This required China should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be a proactive participan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Upholding a principle of “keeping low profile and striving to make achievements” , China went through a hard time arou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hina had withstood the shocks from the drastic change of the Eastern Europe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 broke the sanctions by the US-led western countries , and avoided ideological disputes with those countries. All those made China’s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be in process smoothly. In addition , China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achieve a breakthrough development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newly independent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ll , China’s diplomacy has opened a new phase rapidly by actively promoting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Keywords: China’s diplomacy; keeping low profile; striving to make achievements; DENG Xiao-ping thought; strategy studies

An Analysis of the Antarctic Interests and Rights of China

CHEN Yu-gang , WANG Wan-lu (95)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and pursuit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global common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general national interests. On the one hand , state capability makes the interests in global commons come true. On the other hand , national behaviors in global commons are regulated by international rules in order to avoid happening of tragedy of commons. Meanwhile , state capability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rules are parts of national rights. The pursuit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 global commons is rul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mitation of transformation from state capability to national rights. However , different with national interests , national rights in global commons should be protected to the most extend. On the assumption of Antarctica as a global commons , as an important player China has its interests and rights in Antarctic. Its interests can be divided into political interests , security interests , scientific interests , economic interests. Its rights can be examined from four aspects: the participation rights ,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rights , the governance rights , the geographic naming rights , and the exploration rights.

Keywords: global commons; national interests; national rights; the Antarctic interests; the Antarctic rights